



藏書院 國學文庫

主編 朱漢民

JIANBO SIXIANG WENXIAN YANJIU

簡帛思想文獻研究

個案與方法

劉笑敢 鄭吉雄 梁濤 編著



人民東方出版傳媒
東方出版社



敦煌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朱汉民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

JIANBO SIXIANG WENXIAN YANJIU

刘笑敢 郑吉雄 梁涛◎编著

个案与方法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个案与方法 / 刘笑敢，郑吉雄，
梁涛编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3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ISBN 978-7-5207-0751-0

I. ①简… II. ①刘… ②郑… ③梁…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中国— 古代 IV. ①B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9104号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个案与方法
（JIANBO SIXIANG WENXIAN YANJIU: GE'AN YU FANGFA）

编 者：刘笑敢 郑吉雄 梁 涛
责任编辑：辛春来 来芙蓉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36
字 数：5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751-0
定 价：79.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

本书获得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课题出版资助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
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杜维明 李学勤 张岂之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吕锡琛

朱汉民 刘海峰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张怀承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朴民 黄俊杰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李 兵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

朱汉民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如下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做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茫、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会发现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

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阻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有着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 21 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

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它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明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明进程中，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 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对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必须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存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的，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

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之中。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有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体系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

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代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体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

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忬、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在战乱年代，岳麓书院遗址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拥有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

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甲午年（2014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个案与方法》导言

刘笑敢 郑吉雄 梁 涛

本书是三位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笑敢、台湾大学中文系郑吉雄^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以下称“我们”）自2009年起合作执行简帛文献与思想史研究计划第二部研究成果，与第一部《简帛思想文献选释》一起出版。计划缘起与执行的过程，已见《简帛思想文献选释·导言》，在此不重复。在三年执行计划过程中，我们为本计划召开了多次小型工作坊和较大型主题国际研讨会，广邀东西方学术界前沿学者参加。我们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小型工作坊主要邀请相关专业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商讨分别选取简帛文献十六篇，对各篇做注释、导读和研究，并在工作坊中攻错讨论，汇集众说。最后所有作者集合了大家的意见，为各篇撰写相对稳妥的注释研究，而成为《选释》一书。至于分别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几场主题国际研讨会，则将焦点置于简帛文献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反思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会后，我们选出主题较相近、形式较完整、讨论较深入的一部分论文，汇集成这部书，作为计划第二部研究成果，希望能与《选释》工作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本书首九篇以通论研究方法为主，包含出土文献研究方法、出土与

^① 2012年起在香港教育大学担任文化史讲座教授。

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证、疑古信古的态度、文献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等等，虽然各篇各有侧重，整体上却围绕研究计划关怀的主题。刘笑敢《出土简帛的方法论启示》、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郭沂《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三篇均围绕着“信古”和“疑古”两种态度展开讨论，检讨各种方法问题而提出因应之道。刘笑敢总体认为广泛搜集证据加以比较，重视传世文献的记载，配以合理的猜测以及严密的推理，是可依循的准则。避免盲目自信与傲慢则是应有的态度。梁涛则提出“原型——意义流变说”，举出不少实例，说明二重证据法的内容与效用，包括辨伪、补正等等，希望结合疑古和信古两说之长，走出二元对立。郭沂同意过于“信古”会缺乏批判态度，但“疑古”的过度怀疑，则会颠覆古典学的优良传统，今天应该注意“释古”“正古”，并提出五个论题，主张重建传统古典学，作为正途。第四篇曹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申明了简帛学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如何由证据展开推论、如何看待学派，以及如何把握文字文献与思想史关系三个问题，强调反思过去研究的弊端，应该使哲学史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让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第五、六篇是林启屏《叙述与诠释：出土文献研究之反省》和郭梨华《研究、思考与中国哲学之路——游于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研究之反思》。他们较从哲学史的角度注意经典诠释的问题，林启屏提示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从叙述、动机、立场、信念、学派等角度切入，论析诠释活动在出土文献研究中的重要性。文献叙述者的视野对于史实观点存在不同，而诠释观点与各不相同的学术流派关系又息息相关。郭梨华则借鉴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遇后前沿学者如劳思光、傅伟勋等在方法与方法论上的反思，从论题的“再发现”思考简帛研究中的哲学启发，以期在既有的研究路向推进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第七、八篇柯马丁（Martin Kern）、麦笛（Dirk Meyer）都以早期中国抄本的研究为例说明。柯马丁《早期中国文献研究方法之反思》申论当前英语世

界汉学研究所关注的研究方法论，在中国学术界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由此而提倡在古代中国研究上，应促进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的全球交流。他也提出文献研究中各种关乎文本、作者身份等的问题。麦笛《当文章成为实践：阅读郭店〈老子〉》以郭店《老子》为例，认为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出现了新的书写形式。这种书写，将哲学文本转换为付诸文字的论辩。这种哲学实践，可以归因于早期中国由抄本文化的发展所促进的一种新的文字活动。至于刘国忠《竹简背面信息与竹简编联——以清华简整理为例》论题完全集中在出土竹简整理的方法，而不是简帛文献与思想史的方法。作者是清华简的整理者之一，说明了竹简整理的具体步骤，包括篇题、次序编号、掌握刻画痕迹及其他信息等方法，丰富了读者对整理竹简实务的知识。

接下来七篇比较集中在某一个案，或从文献或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讨论某一种现象或方法问题。夏含夷《非常道考》集中讨论《老子·道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除了征引欧美学者的众多翻译，也引《韩非子》《淮南子》等道法文献作旁证，最后从语法的角度设想四种不同读法，并提出他认为最适切的英译。丁四新《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主要是举《老子》与《周易》为例，说明经部文本与子部文本在古典时期演变历程，文本和其中思想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丁认为应当从“文本考证学”转进到“文本解释学”，以发展的观念来看待古典时期子书的演变。汤浅邦弘《银雀山汉墓竹简〈论政论兵之类〉考释》针对《银雀山汉墓竹简〔貳〕》“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中在篇题木牍上列有篇名的十二篇，就其成立时期和思想特征进行考察，认为这些文献具有一定相关性，但也有部分过往被列入《孙臆兵法》的篇章其实属于独立文献，加以排除后，学界对《孙臆兵法》的理解也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个案讨论的篇章中，集中讨论《郭店楚简》的就有四篇。《性自命出》有“道四术”一语同时又提及“其三术者，道之而已”，整理者并无

解说，因而研究者对“四术”“三术”解读颇有歧异。林素英《从“礼乐”的分合与特性论〈性自命出〉“道”四术或三术的迷思——兼论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透过文本的内证，并将礼乐的天道人道、形上形下的内涵纳入考虑，展现了简帛文献研究与思想史在方法上相通的通则。《五行》篇有“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之语，关乎先秦儒家德性论。李晨阳《竹帛〈五行〉关于德性和谐的思想研究》从欧美伦理哲学“德性的整全性/统一性”（the unity of virtues）的角度切入考察，上溯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关于多种德性对应和谐的思想，讨论到儒门关于各种德性的离合问题，比较希腊和先秦中国的“和”的观念，论证和谐思维能适当地理解仁德的根源与展现。黄冠云《郭店竹简〈六德〉、〈五行〉关于仁义之际的一组词汇》针对郭店竹简《六德》第26—33简大约160字长的段落，尤其是其中几个疑难字词提出新的考释，考索这些关键词在《诗经·大雅·抑》《尚书·皋陶谟》《荀子·不苟》等文献中意义的联系，借此探讨先秦学术对于仁、义准则的相关论述，并尝试复原《六德》以及孟子“仁内义外”说的适当语境。最后一篇是顾史考《楚简韵文分类探析》，它针对《语丛四》以格言谚语为主、有别于其他三篇《语丛》的特性，假设这些韵文反映了楚地方言，考察四句章、三句章等不同结构的不同押韵情形，加以归类，为未来进一步探研楚方言提供了有用基础。

最后五篇是“诸子学派学说新探”。郑吉雄《试论子思遗说》勾稽子思的思想，论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不应被视为子思所作，并讨论了子思天命论、五行说、中和说和仁义内外之论，借以检讨近年简帛文献研究所提出“子思学派”的论点，全文展示了将出土简帛置入思想史进行宏观考察的方法。李锐《对出土简帛古书学派判定的思索》关注简帛古书所属的学派或从属于某一部书的问题，认为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根源于传世文献所引发的学派观念及文献时代判定方法。作者着眼文献，综观多种出土的楚简、秦简和汉简以及帛书，参照余嘉锡《古书